

士人何以不朽：论《史记》和《资治通鉴》中士人形象的经典化建构

鲁家旭，郑淑文

北京印刷学院出版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2026年6月9日；录用日期：2026年7月5日；发布日期：2026年7月15日

摘要

本文围绕“士人何以不朽”的核心问题，采用比较分析法，系统考察《史记》与《资治通鉴》对士人形象的经典化建构。研究发现，《史记》以人物为中心的情感化书写与《资治通鉴》以治道为导向的规范化评价形成了互补的建构路径。士人形象的“不朽”源于双重机制：一是其作为忠、直、廉、能等核心价值的稳定载体；二是其精神高度能超越具体历史成败。这一经典化路径，为当代理解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责任伦理，以及传统文化的创造性传播提供了历史参照与启示。

关键词

士人形象，经典化，《史记》，《资治通鉴》，叙事策略

Why Scholars Are Immortal: On the Image of Scholars in “Historical Records” and “Zi Zhi Tong Jian”

Jiaxu Lu, Shuwen Zheng

School of Publish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 Beijing

Received: June 9, 2026; accepted: July 5, 2026; published: July 15, 2026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core problem of “why scholars are immortal”,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classic construction of scholars’ image in “Historical Records” and “Zi Zhi Tong Jian” by means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emotional writing centered on people in Historical Records and the standardized evaluation oriented by governance in “Zi Zhi Tong Jian” form a complementary

文章引用：鲁家旭，郑淑文. 士人何以不朽：论《史记》和《资治通鉴》中士人形象的经典化建构[J]. 新闻传播科学, 2026, 14(7): 103-109. DOI: 10.12677/jc.2026.147178

construction path. The “immortality” of the image of scholars stems from two mechanisms: first, it is a stable carrier of core values such as loyalty, straightforwardness, honesty and ability; Second, its spiritual height can transcend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specific history. This classicalization path provides historical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contemporary 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 spiritual tradition, responsibility ethics and creative communic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Keywords

Scholar Image, Classicization, “Historical Records”, “Zi Zhi Tong Jian”, Narrative Strateg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研究背景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经典文本与传统文化形象的表达日益受到重视。在中华文明的漫长发展进程中,“士人”作为中华文明高度凝练的文化符号,其承载的道德理想与责任意识,在当代文化传播中依然具有潜在活力。传统士人“学”与“政”相兼的身份特质,使其成为知识传承与社会治理的关键中介。根据士人的知识和技能类别,刘泽华将先秦时代的士人分类为武士、文士、吏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士、方术之士和其他[1]。余英时则指出,中国士人并非单纯依附于权力结构的官僚群体,而是在文化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保持张力、以道统自觉介入公共事务的知识精英[2]。因此,士人不仅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阶层,更逐渐演化成为一种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文化角色,深刻嵌入中华民族的历史叙事与文化记忆之中。

士人形象并非既定事实,而是在历史文本持续地书写、评价与传播中逐步建构的“经典化”结果。这一过程,本质上是文化信息被筛选、赋予意义并代际传承的传播实践。“经典化”并非指作品既成的经典地位,而是强调其在被确立为经典之前,通过反复书写、评价与传播逐步获得权威性与稳定影响力的过程。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两座高峰,《史记》与《资治通鉴》不仅奠定了中国历史书写的基本范式,也通过对人物的选择、叙事与评价,持续影响着后世对士人形象的认知。前者以纪传体塑造富有情感张力的人格典范;后者以编年体构筑服务于“治道”的政治伦理图谱。二者体例与取向的差异,恰恰为考察同一文化符号如何在不同的“传播编码”系统中被差异化建构、并获得持久生命力,提供了理想的比较视角。

在此背景下,本文围绕“士人何以不朽”这一问题,采用比较研究法,以《史记》和《资治通鉴》为研究文本,分析两部史学经典如何通过不同的叙事体例、评价标准与价值取向,将特定士人形象转化为可被反复记忆与传承的文化范式,并据此分析其对人物形象塑造与文化传播的启示。

2. 文献梳理

(一) 史记中士人形象的相关研究

学界对《史记》士人形象的探讨,主要围绕价值塑造、叙事方法、思想渊源与艺术成就四个维度展开。在价值与典范塑造上,刘志伟指出司马迁塑造孔子“素王”形象,以彰显士人超越权位的精神特质[3];陈其泰则从编纂学角度,肯定将孔子列入“世家”是对士人文化价值的凸显[4]。在叙事与史料融合层面,刘金文强调“春秋笔法”的运用使形象兼具历史与艺术真实[5];杨玲以蔺相如为例,揭示司马迁

融合民间口传与正史记载的路径[6]; 蒋玉斌则提出“尚奇”特征与作者儒家苦难意识及民间叙事密切相关[7]。在思想与审美层面, 刘国民关注司马迁对法家士人历史功绩与道德缺陷的二元评价[8]; 王晴指出道家思想为士人形象注入了抒情性与悲剧美感[9]。在艺术成就上, 郭鹏通过与《水浒传》对比, 肯定《史记》“传神写照”的艺术高度[10]。总的来说, 现有研究从不同层面深化了对《史记》士人形象塑造机制的理解, 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 资治通鉴中士人形象的相关研究

学界对《资治通鉴》中士人形象的研究多围绕治道实践与政治文化展开, 核心聚焦士人在帝制中国治理体系中的角色与价值建构。罗雪飞以《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为核心考察, 指出书中士人形象深度契合“垂拱而治、推行仁政、乐听谏言、选贤任能”的治道观, 是君主治国理政的核心辅弼力量, 其形象建构凸显“主体精英化、宗旨王道化、载体明确化”的特征, 强调士人以儒家经典为思想依托, 践行“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11]。余英时结合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 认为《资治通鉴》中的士人形象承载“秩序重建”的使命, 其“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与谏言精神, 成为治道实践的关键支撑[12]。桑怡娜关于北宋前期士人群体的研究虽聚焦具体时代, 但揭示的士人在政治博弈中坚守的治理原则、通过科举与谏言参与治道的路径, 与《资治通鉴》对士人治世能力的书写形成互证[13]。此外, 研究者普遍注意到, 司马光通过塑造兼具德行与治才的士人形象, 既强化了“以史为鉴”的编纂宗旨, 也构建了士人“经世致用”的价值范式, 其形象中蕴含的忠直、廉明、务实等特质, 成为后世士人精神传承的核心内核, 相关研究为探析传统士人形象的经典化建构与当代传播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三) 中华文化中士人形象的相关研究

学界对中华文化中士人形象的历时性研究, 清晰勾勒出其从道德标杆到政治精英, 最终深入地方社会的演变轨迹。先秦时期, 刘全志指出孟子借舜的典范, 将孝亲伦理与王道政治结合, 为士人奠定了“修齐治平”的价值观基石。秦汉时期, 研究聚焦史学经典的系统建构[14]。刘志伟强调《史记》塑造孔子“素王”形象以凸显士人的精神超越[3]; 陈其泰则从编纂学角度, 肯定其为孔子及平民立传的体例突破[4]。魏晋南北朝时期, 士人形象发生复杂演变。孙立涛分析东汉士人在清议中与王权关系从合谋走向区隔, 形成新的人格美学[15]。李磊与权家玉则聚焦南朝, 通过考察“寒微士人”的流动与仕进, 揭示其身份重构。宋代为重要转型期[16][17]。雷鸣、赵天睿, 邓宏图通过量化研究指出两宋士人精神从“外王”转向“内圣”[18]; 李昌舒以范仲淹为例, 阐释其如何成为跨时代道德典范[19]; 罗志田进一步指出, “礼下庶人”的实践推动士人构建兼具文化自治与政治合道性的“士社会”[20]。明清以降, 研究强调士人与基层治理深度结合。罗志田等学者揭示, 士人通过乡约、书院、宗族等载体, 成为连接国家与社会的关键纽带, 角色日益社会化[20]。总的来说, 现有研究清晰地勾勒出士人形象从道德标杆、政治文化精英到基层社会治理者的演变轨迹, 其精神内核与建构逻辑的历时性研究, 为理解士人形象的经典化及其当代意义提供了深厚的历史资源与多元视角。

3. 《史记》中士人形象的经典化建构

《史记》采取纪传体的叙事模式, 以人物为核心展开叙事, 将士人的理想追求、人格气节、才智能力与命运遭际整合进完整的人生叙事之中, 使士人不再只是政治事件的附属角色, 而成为历史书写的主体。《史记》中大量以士人为主角的传记篇章, 共同构成了一幅以人格精神为核心的“士人画廊”, 为后世提供了稳定而持久的文化原型。

(一) 人物中心的士人书写方式与个体命运叙事

《史记》最突出的史学创新, 在于以人物而非事件作为历史叙述的核心单位。司马迁通过单篇传记的方式, 集中呈现士人的一生行迹与精神选择, 使其命运轨迹成为历史展开的内在逻辑。在《屈原贾生

列传》《苏秦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篇章中,士人不再只是时代背景中的“功能性角色”,而是以完整的人生经历进入历史叙事,形成具有高度辨识度的个体形象。这种人物中心的叙事模式,使士人的理想追求、行为抉择与历史情境形成因果关联,增强了人物形象的整体性与连贯性。在这一结构中,士人获得了超越具体时代的“历史生命”,成为可被反复讲述和持续理解的文化形象。

(二) 人格张力与悲剧意识的集中呈现

《史记》中士人形象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其强烈的人格张力与普遍的悲剧意识。司马迁并未回避士人在现实政治中的失败,反而将理想与挫败之间的冲突作为人物书写的核心动力。以《屈原贾生列传》为例,司马迁通过密集的情感化叙事与心理摹画,集中展现了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21]的典型士人命运。传中记载:“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21]此处,司马迁并未停留在事件陈述,而是直接进入屈原的内心世界,揭示其忠贞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尖锐冲突。更为重要的是,列传全文穿插了屈原被疏、被放、自沉等一系列失败叙事,但司马迁始终将其塑造为“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21]的理想主义形象。其人格精神与文学成就在叙事中高度融合,形成震撼人心的悲剧典范。

类似的悲剧意识也体现在伯夷、叔齐等高士形象中。司马迁借其坚守道义而殒身的结局,对天道、公义与历史正当性提出深刻追问,使士人的道德选择具有超越功利成败的价值意义。这种以失败与牺牲凸显人格高度的叙事策略,使士人形象在悲剧中获得精神升华,从而具备持久的文化感染力。

(三) 智慧、谋略与文化人格的塑造

除悲剧与侠义之外,《史记》还塑造了以智慧与谋略见长的士人形象。张良、苏秦、张仪等人物,展示了士人凭借才智介入政治、影响历史走向的可能性。以《留侯世家》为例,司马迁通过一系列富有张力的情节与细节描写,塑造了张良从血性刺客到帝王之师的转变。张良早年“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于博浪沙误中副车,展现的是匹夫之勇与复仇意志。而后,他于下邳桥上遭遇黄石公,“履我”“与期”等情节,通过戏剧化的冲突与隐忍考验,完成其人格的初步淬炼。最关键的转折在于,张良在辅佐刘邦过程中,屡献“借箸代筹”“阻止复立六国后”等关键计策,其建言从不以个人功名为念,始终以天下大势为权衡[21]。其功成身退、愿“从赤松子游”的结局,集中体现了士人在政治参与与人格自持之间的理想平衡。

同时,司马迁还通过《孔子世家》《滑稽列传》等篇章,塑造出超越政治功业的文化型士人形象。孔子作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想主义者,被赋予超越时代的精神高度;优孟、东方朔等滑稽之士则以讽谏与幽默介入政治,展示了士人影响现实的另一种路径。这些形象共同拓展了士人精神的内涵边界。

4. 《资治通鉴》中士人形象的经典化建构

作为中国古代最具政治实践指向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在士人形象的塑造上呈现出鲜明的治道取向。司马光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为史学宗旨,将人物书写严格置于国家治理与政治伦理的框架之中,使士人不再以独立人格或个体命运为叙事中心,而是作为治国理政体系中被反复呈现的关键角色。由此,《资治通鉴》所建构的并非“人格化的士人形象”,而是一幅以政治功能与伦理责任为核心的“士人政治角色图谱”。

(一) 治道导向的士人定位: 政治秩序中的功能性角色

在《资治通鉴》的叙事体系中,士人首先被界定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支撑力量。其价值不取决于个体才情或人格魅力,而在于是否能够在具体政治情境中履行职责、维系秩序、矫正偏差。无论是作为谋臣、谏官还是执政官员,士人的意义始终与国家治理效果紧密相连。

这一取向使士人与君主、制度之间形成高度结构化的关系。例如,司马光通过魏徵与唐太宗之间的

互动, 强调士人“以道事君”“直言敢谏”的政治责任, 使其成为君臣关系中“臣直君明”的理想范式。《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载, 魏徵对太宗言: “愿陛下俾臣为良臣, 毋俾臣为忠臣。”太宗问其异, 徵对曰: “良臣, 稷、契、皋陶是也; 忠臣, 龙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获美名, 君受显号, 子孙传世, 福禄无疆; 忠臣身受诛夷, 君陷大恶, 家国并丧, 空有其名。”[22]此处司马光借魏徵之口, 将“良臣”置于“忠臣”之上, 其评判标准并非个人气节的多寡, 而是政治行为对国家秩序的最终效用[22]。同样, 张释之、汲黯等汉代官员因坚守法律原则、敢于当廷抗辩而被肯定, 其意义并不在于个人胆识, 而在于士人作为制度守护者的功能定位。

(二) 规范化的价值判断体系: 忠、直、廉、能

《资治通鉴》在人物评价上形成了一套高度规范化的伦理标准, 其中“忠、直、廉、能”构成衡量士人价值的核心坐标。史书并不着力描绘人物的内心情感或精神挣扎, 而是通过其政治行为是否符合治道原则来作出判断。

例如, 诸葛亮在书中被反复强调其“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并非仅因其人格崇高, 而在于其忠诚与能力高度统一, 能够在制度授权范围内承担托孤重任、稳定权利运作。《资治通鉴》卷七十载, 诸葛亮向后主刘禅上表, 其中“臣鞠躬尽力, 死而后已, 至于成败利钝, 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之语[22], 被司马光完整收录。此处, 诸葛亮的形象被提炼为“忠”与“能”的范本——其价值不在北伐的军事成败, 而在于完全履行了托孤之责。相较之下, 李斯、冯道等人物则被明确塑造成反面典型, 前者因贪恋权位而背弃原则, 最终自取其祸; 后者在王朝更迭中反复事主, 被批评为“无廉耻者”。通过这种鲜明的正反对照, 《资治通鉴》确立了士人在政治伦理上的行为底线。

(三) 历时性呈现与功能定位: 历史进程中的关键行为者

《资治通鉴》的编年体结构深刻影响了士人形象的呈现方式。由于叙事以时间推进为主线, 士人往往以“阶段性出现”的方式嵌入政治事件之中, 其形象并非一次性完成, 而是在连续历史进程中逐步显现。

如荀彧在汉末政治中的角色, 他既是曹操统一北方的重要谋臣, 又因坚守汉室正统而与权力野心发生冲突, 其结局被赋予明显的道德评判意味。类似地, 王猛在前秦的政治实践, 也通过一系列制度决策与历史后果被加以评价, 其形象更多体现为乱世中“能吏型士人”的制度价值。这种过程化书写, 使士人行为自然转化为治乱兴衰的因果节点。

这一叙事方式带来三个显著结果: 其一, 士人形象与时代条件高度绑定, 其行为被放置在具体政治环境中加以理解; 其二, 人物评价呈现出明显的理性化特征, 强调因果关系与制度后果; 其三, 士人行为被赋予持续延展的历史教训意义, 使个体经验转化为制度记忆。由此, 士人不再是情感叙事的中心, 而成为政治逻辑中的关键节点。

5. 《史记》与《资治通鉴》士人形象的比较分析

(一) 史学立场与叙事重心的差异: 人物史学与治道史学

《史记》与《资治通鉴》在士人形象建构上的最大差异, 首先源于史学立场与叙事重心的不同。《史记》立足于人物史学传统, 以个体生命历程为叙事核心, 通过纪传体结构完整呈现士人的命运起伏、人格冲突与价值抉择, 使人物成为可感、可共鸣的历史主体。具体来说, 司马迁将屈原、荆轲等士人从历史背景中前置为叙事主体, 使其命运成为解读时代的钥匙, 旨在探索“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的普遍人性与历史哲学。因此, 其叙事逻辑是内向的、聚焦于人格成长与精神世界的。

相比之下, 《资治通鉴》以治道史学为旨归, 借助编年体结构将士人行为嵌入国家治理与制度运行的整体进程中, 其书写重点不在于人物个性, 而在于政治行为的制度意义与历史后果。司马光秉持“鉴

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资治宗旨,叙事的核心目的是呈现政治运作的规律与教训。士人如魏徵、诸葛亮,其价值首先体现在对具体政治事件的干预效果上。因此,其叙事逻辑是外向的、强调行为在制度网络中的功能与后果的。

(二) 士人形象建构方式的异同:情感化叙事与规范化评价

在具体书写方式上,《史记》通过情节铺陈、情感张力与人格描写实现士人形象的情感化建构,使士人成为承载悲剧意识与价值冲突的叙事中心。司马迁大量运用细节描写、心理摹画、矛盾冲突乃至合理想象,以极具感染力的笔触突出士人的人格张力与悲剧美感。屈原行吟泽畔的孤独、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的决绝,其力量不仅源于事实,更源于文学叙事所赋予的情感冲击与象征意义。这种建构使士人形象超越了具体史实,升华为承载着忠贞、侠义、智慧等文化理想的情感符号。

而《资治通鉴》则通过稳定的伦理尺度(忠、直、廉、能)对士人进行规范化评价,强调其是否有助于政治秩序与制度稳定。这种差异使前者更侧重文化记忆与情感认同,后者更强调历史教训与制度反思。例如,对冯道“历事五朝”的著名批判,并非基于对其个人境遇的同情式理解,而是严格依据“忠臣不事二主”的政治伦理准则作出的规范性裁断。士人形象在此被抽象为某种政治品质的范本或警示。

(三) 历史功能与传播效应的差异:从“文化记忆的唤醒者”到“政治理性的训练者”

《史记》塑造的士人,其核心功能在于成为“文化记忆的唤醒者”。屈原、豫让、孔子等形象,通过其感人至深的故事和鲜明的人格特质,世代激发着读者对气节、道义与理想主义的共鸣。他们主要作用于情感与价值层面,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套共情性的精神谱系和文化原型,其传播依赖于情感的代际传递与文学化的再叙述。

《资治通鉴》塑造的士人,则主要充当“政治理性的训练者”。魏徵的直谏、诸葛亮的谨慎、李斯的覆辙,被系统地呈现为可分析、可借鉴的治理案例。他们主要作用于理智与实践层面,旨在培养统治阶层的历史洞察力、政治判断力和伦理操守意识。其传播依赖于帝王教育等制度性的学习和对历史教训的理性反思。

然而,尽管两者在叙事重心与形象建构方式上存在差异,但这些差异却形成了互补的经典建构路径。

《史记》通过人物叙事赋予士人以情感记忆与人格魅力,《资治通鉴》通过制度叙事赋予士人以规范意义与教化价值。两者分别从情感共鸣与制度认同两个层面,拓展了士人形象的传播维度,共同构成士人形象得以持续流传的多重机制。这种“人物记忆”与“制度记忆”的叠合,正是士人形象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呈现出“不朽性”的深层原因。

6. 结语

围绕“士人何以不朽”这一核心问题,本文以《史记》《资治通鉴》为研究对象,从史学立场与叙事策略出发,系统考察了经典史学文本中士人形象的建构机制及其传播意义。研究发现,第一,《史记》与《资治通鉴》通过不同的史学取向与叙事体例,共同塑造了中国传统士人形象的基本范式。二者在“人物书写”与“治道书写”上的差异,构成了士人形象在中国史学传统中的互补性经典建构路径。第二,士人形象的“不朽性”并非源于现实功名或历史成败,而是建立在多重机制的共同作用之上。一方面,经典史学通过持续书写忠、直、廉、能等核心价值,使士人形象成为稳定的价值载体;另一方面,通过超越“成败论英雄”的评价逻辑,赋予士人以精神高度与道德象征意义,使其得以跨越具体历史情境,在文化记忆中持续存在。

在价值诠释层面,士人形象的经典化机制表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如忠、直、廉、能)并非空洞的道德教条,而是通过具体的人格典范与历史叙事得以“安家”和“活化”。当代传播若欲激活传统,应避免抽象说教,转而借助“人物中心”或“角色图谱”的叙事策略,使价值理念可感、可亲、可信。在实践

应用层面,《史记》的情感化记忆与《资治通鉴》的理性化反思,为责任伦理构建提供了双重路径:既需要激发个体的人格理想与家国情怀(如《史记》传统),也需要将其纳入制度理性与公共责任的框架中加以考量(如《资治通鉴》传统)。在传播策略上,士人形象的“经典化”过程本身揭示了文化符号生命力的来源——持续的、多媒介的、跨时代的再书写与再评价。《史记》和《资治通鉴》中士人形象的经典建构不仅属于历史,也为我们思考“何为有价值的生命”“何以不朽”等永恒问题,以及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范本与镜鉴。

当然,本文仍存在一定局限:研究文本范围相对集中,对传播的讨论以理论分析为主。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史学文本谱系,并结合具体传播案例与实证方法,深化对士人形象现代转化机制的理解。总体而言,士人形象作为中华文明中最具连续性的文化主体之一,其经典建构及传播价值仍具有持续而广阔的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 [1] 刘泽华. 士人与社会[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 20-33.
- [2] 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3] 刘志伟. “素王”典范造像与人的本质精神价值实现——论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的创作[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49(5): 40-52.
- [4] 陈其泰. 《史记》“世家”历史编纂成就析论——“应另换一副眼光读之”[J]. 文史哲, 2015(6): 102-111+166.
- [5] 刘金文. 论“春秋笔法”与《史记》人物形象的塑造[J]. 齐鲁学刊, 2017(1): 109-112.
- [6] 杨玲. 《史记》蔺相如经典形象的生成[J]. 甘肃社会科学, 2022(6): 72-81.
- [7] 蒋玉斌. 《史记》“尚奇”的深层原因初探[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3): 307-311.
- [8] 刘国民. 《史记》中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二元对立——以法家人物传记为例[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3): 88-91.
- [9] 王晴. 道家思想与《史记》的抒情性[J]. 文艺评论, 2016(10): 36-41.
- [10] 郭鹏. 传神写照与写照传神——《史记》《水浒传》人物塑造方法比较[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4): 52-55.
- [11] 罗雪飞. 帝制中国治道观的意涵及其现代启示——以《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为中心的考察[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23, 12(4): 32-46.
- [12] 余英时. 朱熹的历史世界: 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 [13] 桑怡娜. 北宋前期南方士人群体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沈阳: 辽宁大学, 2023.
- [14] 刘全志. 孟子对舜形象的塑造与为士人“立法”的价值追求[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1(4): 209-223.
- [15] 孙立涛. 东汉清议与士人文化新变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3.
- [16] 李磊. 从乡里到京邑: 南朝“寒微士人”的城乡流动与仕宦取径[J]. 历史教学(下半月刊), 2025(1): 22-34.
- [17] 权家玉. 南朝“小选”与门生出仕——制度视野下的寒人兴起与士庶关系[J]. 文史哲, 2025(1): 85-98+167.
- [18] 雷鸣, 赵天睿, 邓宏图. 科举、地方精英与传统社会的演化: 来自宋元中国的证据[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24, 44(12): 111-128.
- [19] 李昌舒. 范仲淹经典形象生成与传播的当代政治哲学诠释[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6): 23-30.
- [20] 罗志田. 道在民间: 近世“礼下庶人”的努力与“士社会”的演变[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0(1): 1-23+260.
- [21] [汉]司马迁 撰.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22] [宋]司马光 撰, [元]胡三省 音注.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